

1978

1979 深圳建市

1980 成立特区

1984 “深圳速度”被载入史册

1990 深交所开业

1992 南方谈话

1995 掀起“二次创业”

1999 首届高交会

2005 新定位：自主创新型城市

2010 迈入大特区时代

2017 GDP 媲美香港

2018

我们深圳 四十年

深圳人眼里的深圳事，让你读懂中国奇迹

斯培森 著

深圳四十年神话，

中国改革开放最轰轰烈烈的现场，

现代中国精神的根据地，

梦想的实验场。

这里有人的故事，城的传说，国的精神。

江苏人民出版社

我们深圳 四十年

深圳人眼里的深圳事，让你读懂中国奇迹

斯培森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我们深圳四十年 / 斯培森著. -- 南京 :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214-21949-7

I . ①我… II . ①斯… III .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 ①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96571 号

书 名 我们深圳四十年

著 者	斯培森
责任编辑	曾 偲
责任校对	鲁从阳
责任监制	王列丹
装帧设计	许文菲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19.25 插页 2
字 数	231千字
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4-21949-7
定 价	48.00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如果谁要写一本回顾改革开放历程的书，那么读者将发现，深圳占据了开头的大部分篇幅，如果顺着页码向后翻，也许难以找到有关深圳的字眼，这是因为改革的巨轮已从沿海驶向了内地，而深圳应能领会得到，这便是对“排头兵”最佳的褒奖。当中国改革从浅滩驶入深水区，深圳没有卸下戎装，而是护卫在母舰的侧翼，朝着她既定的航向乘风破浪。

中国步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标志，是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决定把全党的重点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政策。

1979年，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元年。

同年3月，国务院批准广东省宝安县改设深圳市，由此，1979年也就成了深圳元年。

两个元年的重叠是时间上的巧合吗？如果不是，又可否将深圳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长子”呢？

从国家认可来看，毛泽东主席把“共和国长子”称号授予了哈尔滨，而深圳，仅为国务院批准的四个出口特区之一。

从上缴税收来看，对中央贡献最大的城市是上海。

从法律地位来看，2010年深圳经济特区扩大至全市前，深圳立法权只在占全市面积不到六分之一的经济特区范围内生效。

对深圳与中国改革开放关系的形容，还是窗口和试验田比较贴切。

试验田这个比方出自邓小平同志：“得抓一个突破口，搞一个试验场，放开手搞。”中国改革开放是一场系统全面的社会变革，作为全新的事业，应当在实践探索中推进，“摸着石头过河”。试验就得选择更多的样本，尝试更多的环境，其试验田当然就不会只有深圳了。经过五年的探索，1984年邓小平在视察深圳后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到1990年，在众多的试验田当中，深圳获得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排头兵的称号，这一称号与邓小平赋予深圳特区“杀出一条血路”的战略使命交相辉映。

深圳市委老领导曾回忆，赴任前夕中央领导叮嘱道：深圳就这么点地方，中央不想你上交什么钱，也不是要创多大的出口，最重要的是你将来要搞好改革，要能走出一条新路子出来。



深圳博物馆 供图

现在我们知道，这条“新路子”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它和计划经济一样，都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然而在当时，市场经济究竟姓“社”还是姓“资”，深圳在搞的究竟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还没有理论上的支撑，换句话说，深圳是在“触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标语牌

雷”。与其说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长子，不如说深圳是改革家们为寻找更灵活的资源配置方式所设下的一队尖兵。只有阐明了这个定位，才能理解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推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快全面开放之时，在深圳于中国改革开放最初阶段的使命已告实现，举国凯歌高奏之际，

深圳所特有的迷惘与《深圳，你被谁抛弃？》的神伤。深圳初期的使命与定位，是前言要阐述的第一个观点。

从这个观点出发，带出第二个问题——计划经济体制为什么要改变？

共和国成立之初，制定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目标，并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来组织实施，这个战略计划有别于今天的报纸电视时常提及的产业规划或产业发展战略，其优先发展不是在均衡前提下对个别产业、个别行业有所侧重，而是要倾举国之力完成苏联帮助中国设计的156个重点工业项目及694个大中型工业建设项目，对照当时中国工业萎缩、农业凋敝、物资奇缺的资源状况，要确保这些项目的上马和实现，就得在其他方面做出让步和牺牲。

这种对于尽快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的迫切心情，既来自对近代中国历史的经验总结，也是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取向。近代大国崛起首先是重工业崛起，先强兵再富国，这是对鸦片战争、五四运动以来，特别是民国以面粉加工、棉纺织业和日用百货等轻工业为主的民族经济片面发展教训的总结，落后就要挨打，优先发展以军工为核心的重工业应该说是所有有识之士的共同心愿，而计划经济正是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所配套的经济制度。若以中国重工业发展效率来衡量，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成功研制出“两弹一星”，可以说计划经济体制发挥了极大的功效。人造卫星发射成功的第二年，美国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协商美国总统尼克松来访事宜，次年（1972）春天，尼克松正式访问中国，在上海与周恩来总理共同签署联合公报，宣告两国关系跨越“冷战”走进了新的历史时期。今天的人更应当理性地认识到，在中国经济奋起直追、陆续超越六大工业强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过程中，技术封锁、贸易摩擦、汇率歧视及至边境纠纷此起彼伏，然而敌对势力却始终不敢越过雷池，打断中国的改革开放的道路，饮水思源，还是要归功于第一代领导人的高瞻远瞩和计划经济对国家战略项目的突出贡献，直到今天，对国家的长远价值和整体价

值无法用市场估量的战略项目领域，仍然离不开国家计划的保驾护航。

计划经济是由前苏联系统推行的经济制度，其使苏联迅速完成了从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强国的转型，但是中苏两国的资源禀赋又存在很大差异，苏联及其盟友拥有丰富的要素资源，这意味着充足而廉价的原材料供给，意味着在向工业国迈进的过程中，其调剂周转的空间更为充裕，通俗地说，就是不必一味“勒紧裤腰带”。而中国就要困难多了，尽管政府曾经设想在相当长的过渡期内保留民族资本主义，但是在“一五”期间，全部民族资本企业都以公私合营的方式改造为国有。林毅夫教授在《解读中国经济》第四讲“赶超战略和传统经济体制”中谈到重工业的三个特征和发展中国家现实间的三个矛盾时指出：重工业具有项目周期长、关键设备和技术需要进口、一次性投入大三个特征，而发展中国家则存在资金积累少、外汇价格高、资金分散的现实情况。资金积累少，资金价格（利率）就高，建设周期长的项目就会面临难以承受的高额利息；外汇价格高，进口设备和技术就难以支付；资金分散就难以集中动员。政府解决前两个矛盾的做法比较一致，即实行压低利率和抬高本币汇率的政策，而解决后一个矛盾则视于各国行政干预力量的强弱，中国采取的办法是给予重工业产品企业垄断地位，确保其产品定价的垄断收益，同时压低各种投入要素价格，包括资金、原材料、工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这样一来，如果企业不是国有，就会利用计划体制造成的价格扭曲，将被人为压低价格的要素投入到投资较少、周期较短、需求较旺、利润较高的轻工业领域，从而偏离国家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方向。

国家计划在为特定目标服务时能够释放出巨大的威力，但是在当时条件下暴露出很多难以弥补的不足。对于当时的中国经济来说，一是管得太宽，二是管得太细。太宽，是对构成国民经济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个环节实施统管，企业不能自主经营，又不能自负盈亏，使得企业成为行政部门的附属，难以发挥生产积极性。太细，是对人力、金额、

深圳博物馆
供图

物资具体到基本计量单位，落实到具体经济生活中，就容易造成浪费和腐败。特别是到改革开放前，人均国民总收入已经下滑至全球倒数，落后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改革已经成为了多数人的心愿，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唱响为新的时代呼声。但是怎么改革呢？是在旧框架内修修补补，还是一定程度的“推倒重来”？这个问题在当时还没有答案。计划经济体制作为服务重工业优先战略的配套政策，出色地完成了历史性任务，但是在党的工作中心转到经济建设后，其在资源配置方面僵化的缺陷就暴露出来了。阐明这个观点，就能理解建国初期为什么不得不实行计划经济，以及当军事工业、重工业取得突破性进展后，又为什么不得不做出改变，这是前言要阐述的第二个观点。

“空谈误国，
实干兴邦”标
语牌

那么，下面的问题是为什么是广东？为什么是深圳经济特区？

1979年4月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长习仲勋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段话说明了广东的两个优势，第一是区位优势，第二是联系海外优势；还有一个暗含的优势，就是对于刚刚走向开放的中国人，从情

感上来说，港澳华侨相比美日洋商要容易接受得多了。

还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广东地处岭南，远离政治中心，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居中，不是计划经济的最大得益者，因此选择广东进行试验，一是传统计划经济的干预较为薄弱，二是即便试错了也不会造成全国性的影响。这种观点，实质上是后发优势理论的变形，用俗话说就是“船小好调头”，可是它忽略了行政干预的力度，在当时无关地理位置的远近，否则改革就不会那么一呼百应了，并且，如果远近可以作为选择改革试点的依据，可选的也不只是广东。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和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这就是象征特区“出生”的中发50号文件，批准在深圳、珠海两市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特区。1980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将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这四个出口特区统一更名为经济特区。

在四个特区中，深圳面向香港，珠海面向澳门，汕头和厦门面向东南亚，这是区位优势。然而在四个特区所面向的地区中，唯独香港在经历廉政风暴和产业升级后，短时间内成功跻身亚洲经济龙头，成为了全亚洲最繁荣富裕的地区和自由贸易港，这就意味着它有足够的资本、经验和渠道来孵化深圳。这个特殊的地缘优势，使得深圳相对另外三个特区有更雄厚的基础，能实现高于其他特区的发展速度，抚今追昔，可以说香港对于深圳及至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都功不可没。深圳的特殊地理位置成就了早期的辉煌，但是由于深港之间有着密切的经济关系，在香港经济出现严重放缓后，深圳的产业发展道路也面临过一次新的选择，这是前言要阐

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1979] 50号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 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 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

中央广东、福建省委、省革委、中央、国务院各有关部、委、局：

中央、国务院原拟同意广东省委《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和福建省委《关于利用侨资、外资，发展对外贸易，加速福建社会主义建设的请示报告》，现特发给你们参照执行。

广东、福建两省靠近港澳，华侨多，资源比较丰富，具有加快经济发展的许多有利条件，中央确定，对两省对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

述的第三个观点。

在阐述完以上三个观点后，就要对深圳历史的几个发展时期进行梳理。2005年，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战略中心主任冯苏宝在《深圳经济特区如何进一步开放》中提出：“深圳特区的开放事业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从开辟以招商局蛇口工业区为代表的以园区经济吸引合资独资企业，到外资参与城市高楼群、商业设施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到以港澳台为主体的加工贸易企业蜂拥而至，再到国际大型制造企业、跨国公司、科技企业、服务业、金融、商业、分销网络大规模进入，到今天，已以一种乘数效应，形成了外向性因素进入的洪流之势。在深圳的发展思路上，也相应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和成熟的伸展线：由单纯推进外贸出口，到建立工贸结合的外向型经济结构，到用知识资金密集型和高科技提升产业结构，再到全面建立现代化、国际化经济结构。”这段话被很多研究深圳的论著所引用，可以视为评价2005年以前深圳经济发展的通行观点。结合切身体会，我把深圳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一、开创时期（1979年至1990年代初），有破有立，“破”针对的是传统制度和观念约束，“立”是以蛇口、罗湖为龙头的工业区建设和城市商业建设，可以想见，这个时期从无到有的深圳能创造多少个“第一”，在价格制度、工资制度、基建制度、劳动用工制度方面取得了很多突破，率先取消了票证制度，打破了“铁饭碗”，敲响土地拍卖“第一槌”，发行了新中国第一张股票，成立了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和证券公司，用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建成内地第一高楼等。尽管在1985年，深圳经历了一场“风波”，有学者通过数据比对，得出深圳经济偏离了工业出口的政策方向、是在发贸易财的结论，但是依靠邻近香港的区位优势 and 特区的优惠政策，在经历了一段短暂的调整期后，深圳的加工制造业迅猛发展，经济水平恢复了节节攀升的良好势头。不光如此，电视、音响进入千家万户，香港影视歌曲随之席卷而来，深圳人眼界为之大开，不仅衣着谈吐与之看齐，行为观

念也随之潜移默化，这个阶段不论户籍居民还是南下经商、打工者大都笑逐颜开。仓廩实而知礼节，社会各界也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祥和景象，就像学者批评的那样，早期深圳的经济内贸大于外贸，深圳人能享受率先发展的成果离不开内地同胞的支持，感之于心、见之于行，深圳人的慷慨与内敛也赢得了广泛的美誉，深圳特区经验多次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肯定，到深圳去、向深圳学习、与深圳看齐成为一时的社会风尚，但是暴富之后，消费渠道不足、假冒伪劣充斥、各种社会问题也随之萌芽滋生了。

二、转型时期（1990年代初至21世纪初），在经历了最初顺风顺水的十来年后，深圳开始面临一系列青春期的“烦恼”，各项经济指标依然表现强劲，但是赚钱好像没那么容易了，工资几年不变，各种规矩越来越具体，物价指数接连上涨，贫富分化接踵而来，一边是争奇斗胜挥金如土，另一边，中小企业和工薪家庭景况堪忧，一股浮躁和失望的空气飘荡在大街小巷，舆论争议的焦点从特区该不该“特”的艳羡悄悄变成了特区还“特”否的置疑，怎样“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成了这个时期最困扰深圳的命题。

1990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开发、开放上海浦东，邓小平说：“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浦东开发晚了，是件坏事，但也是好事。可以借鉴广东的经验，可以搞得好一点，搞得现代化一点，起点可以高一点。”这些话无疑会触动深圳人的神经。1992年南方谈话发表后举国欢腾，当年10月召开的十四大，正式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深圳光荣完成试验田任务后，迎来了一波接一波来学习取经的各地官员，但是潮水还没退去，在中央党校的一期培训班上，特区优惠政策招致了后发地区学员的群起而攻。1993年8月，清水河仓库发生爆炸，几乎使整个罗湖区和半个福田区毁于一旦；未几，葵涌镇致丽玩具厂又发生大火，因逃生通道被焊接锁死造成84名女工惨遭不幸，两起严重的责任事故震惊中外。1994年国家实行分税制改革，深圳作为国家计划单

列城市，享有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意味着深圳创造的财富由深圳市与中央政府分割，而广东省无缘分享。这样一来，虽然避免了对省上缴税收，却也削弱了省支持市的积极性。1994年6月，江泽民考察深圳等地时强调：“经济特区要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如果把特区优惠政策视为“老”优势，那么“新”优势究竟在哪里？1996年4月1日到12月9日，上证综合指数涨幅达120%，深证成份指数涨幅达340%，为抑制股市疯牛，《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的社论，点名批评利用银行资金炒作自家股票的深圳发展银行，也有人认为深发展的做市实际并不仅仅是企业行为，其背后还夹杂着深沪两地证券金融业的龙头之争。同时，国务院宣布调整证券交易印花税分享比例，决定自1997年1月1日起将由中央与地方各50%的分享比例，调整为中央80%、地方20%。1997年2月邓小平逝世，各地群众自发组织哀悼，深圳市民的感觉似乎要更加凄凉。7月香港回归，深圳的窗口使命也告初步实现，随后香港深陷亚洲金融风暴数年不见起色。1998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进行了大区行改革，全国各省级分行被整合为9个大区分行，深圳分行划为广州分行下属的中心支行，一叶知秋，数家外资银行闻声撤出深圳。2000年深交所停止新股上市，不幸纳斯达克指数崩盘令筹备中的创业板启动时间一再延宕，此后数年，全国新设立的基金公司除一家落户广州外，全部落户上海，到2004年深交所重开中小板时，上交所的市场规模已然令深圳望尘莫及。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使得庞大的人口规模从难题变成了红利，但其国民待遇原则也令特区优惠政策渐成明日黄花。在深圳遭遇连番挫折、倍感失意时，2001年上海召开了APEC年会，2002年取得了世博会的主办权，该年深圳又兴起了招行、平安、华为、中兴、沃尔玛将把总部迁往上海的传言，于是在这一年年底，一篇题为《深圳，你被谁抛弃？》的网文刺中了深圳人的软肋。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虽然连串失意多少影响了深圳人的自信，回过头看，深圳的产业转型正是在那

个时期搭建了良好的开端。在借助加工贸易完成初步积累后，深圳市委市政府提出“二次创业”的口号，向高新技术产业进军，《瓦森纳协定》禁止向中国出口的顶级芯片等尖端科技产品和中国加入WTO之前高关税的电子元器件，又是借道香港从民间渠道进入了深圳企业的实验室和车间，使得深圳企业的技术实力在全国异军突起，1999年深圳举办了首届高交会，借助全球网络科技热潮顺利推动科技创业，除了通信行业的华为、中兴两个龙头，网络公司以腾讯、迅雷为代表，计算机方面涌现了长城、开发科技等知名品牌，还培育出华强北这个被称为亚洲最大的电子元器件交易中心，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遂取代传统加工制造，夺得第一支柱产业的王座，宝安、龙岗这两个传统制造业基地则有意识地实施技术改造升级，自1993年起深圳外贸出口值连续多年全国第一，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渐居全球第四，现代物流业和现代金融业与之齐头并进，共同形成三大支柱产业，顶起了“深圳制造”的苍穹。由于正确利用了珠三角整体崛起、长三角后来居上、制造业内迁所腾出的空间资源，找准了产业发展突破口，才使得深圳有充足的底气，在2005年提出建成自主创新型城市的发展目标，争取实现从“深圳制造”到“深圳创造”的转变。

除了经济转型，这个时期的城市治理也同样面临严峻的考验，产能不断提升、劳动需求旺盛，深圳的人口规模从刚建市时的33万增加到了近千万，第一代“开荒牛”渐已老去，第二代“深圳人”也到了择业、适婚、为人父母的年龄，人口数量和结构的急剧变化对深圳城市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电力供应不足；入夏后部分企业只能每周开四停三甚至开三停四，居民区电水两停也常有发生；道路承载能力不足，雨季四处积水，堵车现象严重；公共服务配套不足，重大疾病还要去北京、上海、广州等老城市诊治，中小学位紧张，来深建设者及其家人社会福利得不到满足；文艺产品档次不高，行政执行能力退化，加建抢建屡禁不止，社会治安和安全生产态势十分紧张。过去20多年的发展中，深圳一直偏重“经济”，过度重视其“经济特区”职能，对城市建设欠账太多，

最终演变成一个令市民难以忍受的实实在在的问题。2005 年新任市委书记总结了深圳的四个难以为继：一是土地、空间有限难以为继；二是能源、水资源短缺难以为继；三是人口不堪重负难以为继；四是环境承载力严重透支难以为继，从增强危机意识的角度，给深圳的发展模式敲响了警钟。在提出四个难以为继后，要求深圳以特别之为立特区之位，“我们争气了，以创造力、活力赢得了中央、省委的更加重视，中央和省委还会为我们创造更好的改革开放的机遇和条件，这是相辅相成的。”

三、成年时期（21 世纪初至今），对于这一时期的建设



深圳博物馆
供图

成就，创造了多少个“第一”、多少个“最”，本文不复赘言，前文在对深圳转型时期的叙述中已经埋下了伏笔，在经历了关外城市化和特区一体化、责任风暴和治庸计划、清无行动和梳理行动、发展现代服务业、举办文博会和大运会、开发前海、实施东进和“马上就办”后，深圳的城市功能和治理

深圳精神的广
告牌

水平已经有了质的提升，国民经济蓬勃发展，城市建设日新月异，“深圳速度”向“深圳质量”进军，PM2.5平均浓度在一线城市中处于最低位，“深圳蓝”成了深圳的一张新名片。

2012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十八大后调研地方的第一站就是深圳，彼时的深圳早已不是几十年前单枪匹马的孤胆英雄，而是背靠强大祖国的创新先锋，彼时的中国城市也已经百舸争流，有强大的基础设施为后盾，有十三亿在党领导下全面奔向小康的中国人民，任何产业中国一旦进入就会很容易把现有企业的利润段吞噬，展现出横扫全球的成本优势，这样一来，发达国家不在技术和贸易上遏制中国是不可能的。然而我们要理性看待遏制，遏制越强，说明我们距离复兴大业的实现越近，更要求我们维持现有龙头产业优势，并且培育出更多技术领先的新兴产业，在更多领域掌握产品的定价权。实现中国梦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同城市、不同区域有不同的分工，深圳要当排头兵就应该认清使命、不忘初心，做创新驱动的“领跑者”，跳出狭隘的地方本位思维，把关注点放在国家竞争力排名而不是城市竞争力排名上。

改革永远在路上，市场经济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端，随着中国共产党治国能力的提升和大数据等革命性信息技术的涌现，政府在维护宏观经济稳定、实现长期目标和促进共同富裕方面的作用可以更好地释放出来。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取决于要实现什么样的目标，实际上“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都各有其优势和不足，它们都能为中国所用，为实现“中国梦”服务。习近平说：“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机统一的。”这是对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国内外经验教训的总结。如果按某些专家的建议，从市场成本角度出发，发达国家有的我们就不研发、不生产，生硬照搬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来确定产业政策，全球财富格局就不会有变化，那么比较优势就成了发展中国家“通往奴役之路”。当前，有一些声音提出要修改《劳动法》，调降工人薪酬待遇，实际上，随着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过渡，人力变贵而资本变

得相对便宜,恰恰是对中国经济增长道路正确性的现实证明。

还要指出的是,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积累了雄厚的资本,但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肩负着建设共产主义的伟大使命。2008年与中国擦肩而过的金融海啸使西方发达国家深陷系统性困境,放任资本自由发展,实现表面繁荣的后果是国家健康的长期透支。2011年美国民众发动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是对国际资本垄断统治的觉醒,中国作为主权独立完整的社会主义国家,驾驭和节制资本的能力较强是制度优势的体现。在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低谷时期,中国以向国际资本主义“让步”的方式赢得了30多年的发展机遇后,终于冲出了资本主义的包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张文木教授指出:“在目前及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消灭资本是不现实的,共产党就必须学会驾驭和节制资本,不能让资本凌驾于人民之上。”

在驾驭和节制资本的道路上,拥有证券交易所和创业板发行权的深圳,应该深刻认识自身承担着建设全国性经济中心和国际化城市的两项国家使命,要树立资本为实体经济服务、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服务的观念,警惕金融资本唯利是图积聚风险,防止以金融创新的名义制造泡沫、兴风作浪。发挥好证交所、银行总部、保险公司总部、创投基金、科研前沿基地、超大口岸作用,盯准生命健康、航空航天、机器人、可穿戴设备和智能装备等未来产业和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创新链、产业链和资本链的有效融合,在前沿创新、内地引进和更新的雁阵模式中发挥领头雁作用。在建设国际化城市的过程中,应该把开放和共享理念作为统领,正确处理超常规发展和超大型城市建设中积累的矛盾和问题,一方面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努力建成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以扩大开放拓展空间;一方面着力补齐民生短板,强化法治建设,使发展成果公平共享。在实现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未来中国还将进行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改革,为深圳以特别之为、立特别之位提供更多可贵的机遇。

本书正文部分以编年的体例叙述国家层面与深圳息息相关的改革进程、本人家庭的变迁，以及深圳本地所发生的大事。本书记事时间始于深圳设市的1979年，截止到2018年初。2011年以前每年独立为一章节，2012至2016年，由于间隔太近合为一章，2017年至2018年初作为一章兼全书总括，共35章。考虑到在精神文化生活相对单调的改革开放初期，公众对文艺作品及其所反映的全新生活方式向往之强烈，即可想见这类新鲜作品对内地流行观念的形成和变迁影响之深远，而香港作为当时中国西风东渐的主要窗口，经过香港吸收转化后制作的流行音乐和影视作品，无疑更能符合内地居民的审美偏好和精神追求，其对深圳及内地公众的精神世界影响之深，也不言自明。本书尝试将当年度流行歌曲的名字作为章节名，并攫取其歌词中较能反映和贴近当年流行观念及社会现象的段落，作为每一章的开篇，本书上半部分主要选用香港年度流行歌曲，直到90年代中后期，随着内地精神文化产品的日益繁荣，这种香港流行文化在深圳民间的主导地位得以改观后，选取范围才扩大到全国。

在深圳市设立的头几年，记录其创业历程的政务史料、小说剧作不敢说汗牛充栋，起码也是高度等身，无须本书重拾牙慧，其时深圳的城市建设才刚刚起步，并未形成今天这样庞大的市民群体，社会、民生方面的大事不多；而靠近2017年的几年，由于事件发生时间过去不久，加之网络的全面推广，其本末多为公众所耳熟能详，本书也不准备展开赘言，而仅就本市居民身份补充一些细节和观感，这样就使得本书对深圳的记述会出现前后短、中间长的篇幅特点。

本书不是社会学城市调查，深圳的改革开放道路也远未到盖棺定论的时候，之所以要在这本文学作品的前言里对深圳的经济、社会进行一番颇为严肃的评述，是因为深圳所处身的时代、所担当的任务、所经历的曲折都甚为特殊，先行者的特殊或许能成为后来者的普遍，若不耗费文字把这些因果交代清楚，仅以虚拟的或笼统的背景，展开翩翩的遐想和抒情的记事，无疑是没有多少价值可言的。